

1640年

英国革命

克·希尔著

1640年 英国革命

克·希尔 著

舒贻上 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CHRISTOPHER HILL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

LAWRENCE & WISHART LTD

LONDON, 1955

根據勞倫斯-韋沙特書店一九五五年第三版譯出

1640年英国革命

〔英〕克·希尔著

舒 胎 上 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寶文堂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 $2\frac{1}{8}$ 字數45,000

1954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300 定價（9）1.24元

統一書號 11002·212

封面設計者：錢月華 校對者：冷蕙華

序

这篇論文是在一九四〇年初次出版的，在这第三版中已作了少許修改。若把最近对本时期的一些研究成果納入本版中，特别是把莫里斯·多布所著“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書中的劳动成果納入本版中，恐怕还需要更为着实地訂正和增补本書才成。同时这篇論文必須当作一个初步探討看待，因为它很不成熟而且过于簡單。对于我的某些概括如需要文献根据时，讀者可以参考劳倫斯—韦沙特書店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昔时义举”一書。

有两个名詞似乎曾經引起某种誤解，如果我在这里給这两个名詞下个定义，那可能是有益处的。

我使用“封建的”这个字是按照馬克思主义的涵义，而不是按照大多数学究式的历史学家們的涵义使用这个字眼来叙述軍事和法律的关系。至于“封建主义”，我意是指一种社会形态而言，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經濟基础是农业，并且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政权是被地主阶级所独占的。人口的大部分是由依附农民組成，他們是靠着他們家庭的保有地的出产来过活的。地主們則靠着农民們所繳納的地租为生，在古时地租是采取粮食或劳役的形式，或則(到十六世紀时)采取货币的形式。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有余地发展小手工业、产品的交換、国内和海外的貿易；可是商业和工业都隶属于地主們和他們的国家且被他們所掠夺。商业資本可能在封建制度里发展而不改变生产方式；只有在工业和农业里发展了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后才对旧統治阶级

和它的国家发生挑战作用。

在这篇論文里所用进步一詞并不一定蘊涵着道德上的贊許。它单只意味着：所謂进步的趨勢或社会集团曾对公共財富的扩展有所貢獻而已。十六和十七世紀的“进步的”（即資本主义的）耕作导致了許多小农的土地的被征用；用新方法生产的財富落到一小撮投机商人的手中；村社就被破坏了。可是，更多的財富已生产出来：不然就会是經濟的蕭条或衰退，二者必居其一。十八和十九世紀西班牙显示出这种蕭条对于公共的政治和文化的生活的意义。最后因英国資本主义的兴起而創造了新的財富，才开辟了按新的标准施行較平均分配的可能性，正象十九世紀工业革命的恐慌創造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一样。因此我虽然远非絕對地“贊許”任何一个我所標記为十七世紀的“进步的”趨勢，但是暗示出当时可能的選擇中就是那个趨勢可取（因为它发展了国家的財富），如果没有那个趨勢就不可能会进到一种更好的社会。我們毋須把“快乐的英国”理想化，以便了解：因中世紀村落的瓦解而有很多損失；但是中世紀村落的相对的平等和公社精神始終是与大多数人口的赤貧相伴存在的，而且無論如何是十六世紀注定的。与合理的和上升的生活标准相結合的平等和公社精神，只有在資本主义已經完成它替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工业基础的历史任务之后，才能达到。因此今天我們終於能够找到我們的實現一六四九年的平均派和垦殖派的梦想的道路。

克利斯托費尔·希尔

一九五五年三月

目 次

序.....	1
一 导言.....	1
二 英国革命的經濟背景.....	9
(甲)土地.....	9
(乙)工业和商业.....	18
三 英国革命的政治背景.....	24
(甲)都德王朝.....	24
(乙)对斯图亚特家族的反抗.....	30
四 革命.....	41
供进一步閱讀的書目.....	62

一 导 言

这篇論文的目的在于解釋十七世紀的事变,这个解釋和我們大多数人在学校所学是不相同的。簡單地說,这个解釋就是:一六四〇——一六六〇年的英国革命是一个偉大的社会运动,如同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一样。保护着一种封建本質的旧制度的国家权力已被暴力打垮,政权轉移到一个新階級的手中,因此資本主义才可能更自由地发展。內战已是一种階級斗争,其間查理一世的专制統治受到英国国教和保守的地主們的拥护。議會攻击国王,因它能够求得城市工商阶层热烈的支援,能够求助于自耕农和进步的紳士,并且随时可以求助于更广大的群众,只要他們能够通过自由討論而了解所斗争的实际目的是什么。这篇論文的其余部分将试图証明并例証这些概括。

对于十七世紀革命的正統的态度是錯誤的,因为它并没有打算深入到本質,因为它从表面上来評价革命参加者,并認為寻找人民的战斗目的的最好方法是考虑領導人所說的他們的战斗目的。我們都知道在十七世紀之間英国經歷过一种深刻的政治革命。人人都听說过克倫威尔和他的圓顛党人,国王查理和他的王党黨員,并且我們都知道有一个英国国王弄到自己的头被砍掉了。可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它都包括什么内容呢?它对于我們今天來說有没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些教科書里通常都沒有滿意地解答这些問題。和

那革命相伴随的流血和暴力都被忽視為可悲的偶发事故，因为当时英国人曾一度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他們染上了欧洲大陆的恶习，为政治而互相厮杀。但是那不过是因为失去了爭取英国人的和解的机会；那些教科書暗示我們今天是聰明得多了和更加理智了，这真正是一件好事啊！因此那些教科書从沒有給我們提示我們看来还充分的理由，以証明我們的祖先在他們斗争中的忠誠和牺牲。

对于十七世紀革命最通常的解釋就是由一六四〇年的議會領導者們自己对人民的宣傳文件和呼吁書中所提出的說法。从那时以来它曾被民权党人和自由派历史家們添枝添叶地一再重述。这一解釋說，議会的軍隊曾为着个人和他在法律上的权利而战，来反抗一个暴虐政府，即不經审判而把人們投入牢獄、不征求个人同意而向他征税、在人們的家里駐屯軍隊、搶奪人們的財產、并企图破坏人們所珍爱的一些議會制度的暴虐政府。現在看来，上述这些都是事实。斯图亚特家族确曾試圖禁止人民集会和举行政治討論，确曾割掉那些批評政府的人民的耳朵，确曾专橫地征收在稅額上极不适宜的捐稅，确曾試圖解散議會而用所任命的官吏来統治国家。所有这些都是事实。十七世紀的議會真正地代表普通人民的程度虽然还不及今天的議會，但議会的胜利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給社会上較富庶的階級是建立一定程度的自治政治。

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問題未曾得到解答。为什么那个国王变成了暴君？为什么議會中代表地主階級商人的人們不得不為他們的自由而战？当十六世紀时，在都德王室的統治者之下，一六四〇年的反对查理一世的議會党人的祖父們原都是君主政体的最坚决的拥护者。发生了什么事情才改

变了他們的观点？議會曾經帮助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以及伊丽莎白，极力用他們私蓄的军队去镇压力量过大的臣民的和封建統治者的叛乱和搶劫，因而曾經使英国安然实行商业主义。議會又曾帮助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进行他們对国际天主教教会的斗争而获得胜利：金錢不复从英国送往羅馬，英国的政策不复为外强的利益所左右。議會终于鼓励了伊丽莎白女王，使她抵抗羅馬教皇的政治同盟者，西班牙帝国；而且給得列克、豪金斯和海盜式而是新教徒的熟练水手們以劫掠新世界的机会。

都德王室，总之，都受到了那些在政治上强有力的阶级的支持，因为后者由于都德王室的統治过得很好。为什么斯图亚特家族、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都失掉了这种支持呢？并非只因为在一六〇三年继承了伊丽莎白的詹姆士是一个特別懦弱的人，一个不了解英国的苏格兰人，虽然有許多历史家曾經認真地持这种主張。可是任何人只須閱讀一下詹姆士、查理及其拥护者們所写的和所說的，或則考查一下他們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們决非单只懦弱，他們不是試圖貫徹恶毒政策的能手，就是思想不可救药地落后因而反动的人。内战的原因必須在社会中去找，而不能在个別人們中去找。

另一派历史家——我們可以称之为“王党”，王党同民权党是对立的——硬說王室的政策从不是暴虐的，还說查理一世，当他在判他死刑的法庭中供述时，談过“不仅是为着我自己的权利，因为我是你們的国王，而且是为着所有我的臣民的真正自由”。克拉倫敦，他曾在—六四二年抛弃議会的职务而后来成了查理二世的首席大臣，在他所著“大反叛史”中的几卷强辯的文章里發揮了这种見解；这种見解現

在又被一些历史家所傳播，而这些历史家的政治偏見、保王党或天主教的同情心和对一般自由主义的偏見，弥补他們对历史的理解不足。他們的想法是，查理一世和他的顧問实在是想要保护普通人民，免于遭受小小的上升的资产阶级的經濟的剝削；而且与查理对立的反对派，是一些商人為他們自己的目的而組織和鼓动起来的，这些商人的利害关系，在政治上和下院一致，在宗教上和清教一致。

原来，果然不錯，一六四〇年的英国革命象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一样，是爭取政治、經濟和宗教的权力的一种斗争，由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个阶级增加了財富和实力。但是不能說王室的政府之反抗他們乃是代表一般人民的利益；正相反，那些人民的政党确是国王的劲敌，他們比资产阶级本身勇猛、殘忍和彻底得多。

查理的君主政体所代表的利益决非一般人民的利益。它代表着拥有土地的貴族們，并且他的政策为一个宫廷党派所左右，而这个党派是由貴族的商业的訛詐錢財者們和他們的食客輩所組成，他們慣用种种經濟的剝削方法从一般人民身上吮取鮮血，这些剝削方法我們往后将要有所論及。中等阶级为摆脱这一集团的控制的斗争不单是自私自利的；它还起了一种进步的历史作用。比較机敏的地主們使他們自己寄生到新生的资本主义上面，因為他們自己的那种經濟生活方式已經不复足以維持他們。要想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用推翻封建国家的方法来結束这种窒息的寄生状态。当时如果允許资本主义自由地发展，那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在旧的制度之下，在一六四〇年以前的一百年里，工业和农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資降低到一半

以上；在一六四〇年以后百年中則降低了一倍以上。

十六和十七世紀新的經濟發展使得旧的經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成为絕對过时的事物。它的保卫者中間的那些恋恋不舍地追想着中世紀小农民階級的巩固和相对地妥穩的人都是非常不现实而且实际上是反动的。他們的任务正跟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們相同，因为这些自由主义者以为如果資本主义仍旧用“自由的”十九世紀的方法进行活动，而不經常依靠法西斯和战争，那会多么好啊。可是漂亮的話絕改变不了历史的过程。历史已經前进而把一种想象的制度的辯护者們撤下，正象它撤下了查理一世的拥护者們一样。

所以，这两种見解都是片面的。民权党人強調这个革命的进步性，而輕視这个事实，即資產階級領導这个革命，以及革命完成后获益最大的是資產階級。他們的解釋使得資產階級和国民的利害相一致的傳統說法繼續存在，它对于我們今天显然是合宜的說法，虽然它現在却远不及在十七世紀时那样地正确。保王党，恰恰相反，強調这革命的階級性而企图否定它在它自己的时代里的进步性和价值，粉飾封建主义，并暗示革命决不能使一个狭小党派以外有所裨益。近来有一种意見則暗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把戏，一切主义都是欺詐，一切革命都是无益的。

第三种更为世所熟知的見解却是为双方所強調的：即这个冲突是来决定清教和国教两种宗教中的哪一种应当在英国占优势。在这里，这种解釋的效果又一次足以使我們怜悯和誤解十七世紀的人們，并且幸喜我們自己今天是聰明的多了：尽管英国国教徒和非英国国教徒个人也許互相嫌惡得很厉害，我們說，他們不会再在村里大街上打架了。

但是这种說法却抓不着要点。的确十七世紀的小冊子文獻中記載着許多宗教的爭端：雙方最後都用宗教的說法來證明他們的態度是正確的，雙方都相信他們是在打着神聖的仗。可是“宗教”包括的內容比今天它所包括的更為廣泛。在中世紀，直到十七世紀，當時的教會是和今天我們所說的教會大不相同。它曾領導人們的所有一切活動，從浸禮到葬儀，而且曾經是走到一切人們所狂信的來世的入口。這個教會教育了兒童們；在鄉村教區里——在那裡大多數的人民都是文盲——教區牧師的說教就是當時關於時事或問題的知識的、關於經濟行為的指導的主要泉源。教區本身曾是一個地方政府的重要單位，募集和施舍象窮人所接受的那樣少數的財物。教會支配了人們的感情並告訴他們應當信仰什麼，供給他們以娛樂和戲劇。他做了現在為許多不同種類的和更有效力的機關——報刊、廣播、電影、俱樂部等等——所做的新聞和宣傳工作。那就是人們在聽說教時曾寫筆記的原故；也就是為什麼政府經常嚴格地指示講道者們所應當宣講的事情。

例如，女王伊麗莎白“曾誦讀她的講道集”（加萊爾說：“象現在統治人物努力誦讀他們的晨報一樣”）；她給一切講道者發出正式的講道書以保證他們講的不錯。“在每一教區的教會里一律要誦讀”這種講道書，結尾是一個分為六段的訓誡，來斥責“不馴和頑強的叛逆”。當時的主教和牧師比今天的主教和牧師更象文官，更象政府行政機器的一部分；而最初承認這一事實的就是宗教人士自己。班克洛夫特——伊麗莎白時代後期的一个教長——挖苦清教徒斷言他們單只管教會事務。“‘教會事務’這些字眼引伸得多遠啊！”他大聲疾呼地說，“你們看這些話會把它們的教長投

入什么样的一个广阔无际的事务的海中。”①英国国教徒胡克尔提出警告说：“你们都是绵羊，不要擅自把你们自己作为他们的领导者，因为应该由他们来领导你们……须知上帝不是一个暴动和紊乱的上帝，而是秩序的和安宁的上帝。”②

那末，教会是拥护现行制度的，所以这个公告和宣传机构保持控制权对政府是很重要的。由于同样理由，想要推翻封建国家的人们就必须攻击并夺取对教会的控制。那就是政治理论所以采用宗教语言为掩护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们十七世纪的祖先们是比我们现代人有良心和更为圣洁。尽管在爱尔兰或西班牙也许情形是如此，但我们在英格兰今天却能够看到用非宗教性的辞句写成的问题，这正因为我们祖先们结束了利用教会做为政权的一种特有的和迫害的工具。我们能够对宗教问题怀疑和容忍并非因为我们比较聪明和比较善良，却因为克伦威尔曾把大教堂当作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最有训练和最民主的骑兵的厩，而获得了一次胜利，从而使人们永远不再因对于圣餐式抱有非正教的见解而受鞭撻和黥刑。在国家权力衰弱和不集中的期间，教会在每一教区设有他的教区牧师，而教区牧师对于每一家庭又有光荣的接近机会，教会能够告诉人民应当信仰什么和怎样作人；并且在教会的威胁和申斥的后面又全都是地狱之火的恐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宗教的冲突。

① 班克洛夫特：“假装的神圣教训概观”，一五九三年版，第二八一—二八二页。

② 胡克尔：“论教会制度的法律”，人人书店版，第一卷，第九五—九六页。

但是人們用宗教的語言說和寫這個事實不應該阻止我們認識到，在表面上是純神學觀念的東西，它背後是具有社會內容的。每個階級創造了最適合自己需要和利益的宗教世界觀，並強加諸人。但是真正的衝突還是在這些階級利益之間：支持着教區牧師的是鄉村地主階級。

那末，不容否定“清教的革命”是宗教的兼政治的鬥爭；不過它尚不止此。人們的戰鬥目的就是當時英國社會的整個性質和未來發展。這一層將在下面的篇幅里有所闡述，但是這裡值得表明一下：當時的人們對於戰鬥目的知道的很清楚，的確比後來的歷史家們清楚得多。

當資產階級的勝利完成以後，思想家如溫斯坦萊、哈林頓、梟維爾、狄福認為戰爭原來是爭奪財產之戰。不僅如此。精明的政治家們在爭奪最熱烈時表示他們很清楚哪些人是他們的對手。早在一六〇三年，詹姆士一世就對議會說清教徒——

“和我們在宗教方面不象在政策和平等地位混合形式上那樣分歧，因為他們經常對現政府不滿並且不能容忍任何權勢使他們的教派在任何被統治得好的國家中成為令人難受的東西。”^①

政治理論家霍布斯敘述倫敦市的長老會的商人階級怎樣成為危害治安的第一個根源，因為它想建立一個象荷蘭與威尼斯共和國那樣由商人們為自己利益而統治的國家。（在議會派的著作中經常地看到與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比較。）克倫威爾的一個上校的妻子胡秦遜夫人曾說，所有“抹煞貧窮朝臣、驕傲的盛氣凌人的牧師、偷偷摸摸的設計師、

① “英格蘭議會史”，第一卷，第九八二頁。

淫蕩的貴族和地主……能够忍耐講道的訓斥、謙虛的習慣或談話或任何善良事情的人的意見的人們都被說成是清教徒。”① 巴克斯特尔是一个主要的清教徒，他說的更加明显：

“英格兰的騎士和紳士的很大一部分……依附于國王……。而且这些紳士們的大多数佃戶，以及人民中大多数最貧穷的人，亦即別人称之为庶民的，也曾服从紳士并都是贊成國王的。站在議會方面的（除他們自己之外）就只有在大多数的州里的較小一部分（有些人这样想）的紳士，和絕大部分的商人和自由保存世襲土地者和中等階級的人們，特别是在那些經營織布业和同类行业的自治市和州中的这些人。”②

他總結說：

“自由保有世襲土地者們和商人們是本國的宗教和礼仪的力量；而紳士們和乞丐們和奴隶佃农們却是罪惡的力量。”③

他把这些階級呆板地混在一起的原故不久就会明白。

二 英国革命的經濟背景

（甲）土 地

英国在十七世紀初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絕大多數的人口生活在乡村，他們全部地或部分地从事糧食或

① “胡秦遜上校回忆录”，人人書店版，第六四——六五頁。

② “自傳”，人人書店版，第三四頁。

③ “巴克斯特尔的遺著”，第一卷，第八九頁。

羊毛的生产。几世紀来,英国社会一向是封建的,是由一些孤立的地方村社組成,它們都是为着本身的消費而生产,在它們之間很少交易。但是漸漸地从十五到十七世紀在这种农业的村社的机构上开始起了一种变化。来自乡村的粮食和羊毛开始运銷到远处:村中的从事紡織的妇女們和农民們都轉变为供应国内市場的商品生产者了。

加之,在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已发見了美洲。英国商人跟着他到了那里,并且飄洋过海到了印度和俄罗斯。随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随着推銷英国布匹的海外市場的扩展,有些区域在經濟上不再是自給自足,而不得不接受粮食并取得羊毛的供給以应紡織的需要。于是我們开始了一种专业的分工。在英国南方——当时本国經濟上的先进部分——不同的一些地区开始集中特殊商品的生产。那些有錢的人或者在他們自己的所有地上或者在所租借的土地上,开始飼养大群的綿羊,耕种粮食供給这种較前广闊的市場,而且他們从中获利不少。因为物价上漲不已。在美洲已經发现了白銀并且在一个时期开始流入了欧洲,当时商业正在扩展而地主与佃农之間和雇主与工人之間的金錢关系已經逐漸代替了用貨物或劳役支付为基础的旧关系。十六世紀整个期間物价上升:英国在一五一〇年和一五八〇年之間粮食价格漲了两倍,而紡織品漲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这正跟我們今天的通貨膨脹有着同样的影响。那些只有固定收入的人越来越穷,那些靠着替市場来貿易和生产以資生活的人就越来越富。所以中等階級就繁荣起来了,高級封建的貴族階級(包括国王和主教)和較小的农民以及工資劳动者們就相对地越来越穷了,只有这些階級中很僥幸地参加这个生意經的一些个別人才是例外。

还有另一种因素。在一五三六到一五四〇年，在所謂宗教改革时期，英国的修道院曾經被解散而且它們的財產被沒收了。这就是斗争的一部分，这个斗争建立了英国的国家独立，来反抗天主教会权力和剝削，因而受到了资产階級和議会的热烈支持。并且他們得到的結果不坏，因为大量从教会沒收而来的有价值的和在此以前不能接触的土地都被投入市場了。

所有这些发生的事件改变着英国乡村社会的机构。土地漸漸地变成最吸引人的投資范围。有錢的人民急于要拿錢来購買土地，而且有錢的人民越来越多了。在封建的英国土地向来是由父傳之于子，老是用傳統的方法来耕种以供一个家庭的消費；土地易手的情形較为稀少。但是現在，因为法律要适应社会的經濟需要，土地已开始变为商品，在竞争的市場里进行买卖，因而在城市里所积累的資本溢出到乡間去了。

英国的西北各地比較地說还没有沾染上从倫敦和各港埠傳播来的商业风气；但是在东南地区却有許多地主正在着手用一种新方法來开发他們的所有地。在中世紀和十七世紀都是一样：一个所有地的首要作用就在于它供給地主（由于他控制別人的劳动）以生活資料。但是，除此之外，在中世紀的那些大所有地曾經以它們的剩余农产物來供应一群家臣，而这些家臣有时会要服兵役，所以那些大地产就成为封建領主們政治权力的基础。現在，跟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制度內部发展，有許多地主或則开始出卖他們的所有地的产物中不供他們家庭消費的那一部分，或則开始把他們的土地租給愿意为市場生产的农民。所以地主們漸漸地用一种新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所有地：把它看做貨幣